

在民国

孙郁 / 著

国危世乱的文人侧影
亦新亦旧的狂士风流
民国最有魅力的这些人那些事

胡适

苏曼殊 李大钊

大钊 鲁迅 周作人

张中行

胡适

徐志摩

齐如山

朱实秋

齐如山

废名

李大钊

齐如山

章太炎

陈独秀

钱玄同

闻一多

钱玄同

徐志摩

齐如山

废名





孙郁／著

荣获《十月》2006年度散文奖
摘得第八届十月文学奖桂冠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民国/孙郁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13-03680-4

I. 在… II. 孙…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民国 IV.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756 号

书 名	在民国
作 者	孙 郁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为军
责任校对	鞠 朗
封面设计	鞠 磊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19.7 万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680-4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国
危
世
乱
的
文
人
侧
影

亦
新
亦
旧
的
狂
士
风
流



自序

孙郁

2004年底,《十月》总编王占君要我在杂志开设一个栏目,于是便有了此刊“民国人物”的专栏写作。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因为忙,心境也发生变化,文章便越发随意起来。一年下来,看到这组文章,心里复杂得很。时光一点点地流逝着,对旧的遗存的眼光确也变化着。于是也疑心自己的文字是软软的水,并未流到思想的景深里。在慢慢的行进里,连一点涟漪也不会有吧?写这些旧闻旧事,对我是空虚生活的点缀,在日趋麻木的浸泡里,它似乎也是小小的刺激。虽然知道也是缥缈的梦,有梦,总比无梦要好,记得张中行先生曾和我说过类似的话。那么也算自欺的回应,世上还总有说梦和听梦的人们,我自己便是这其中凑数的一员。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却是有的人物众多的年月。在无聊的时光里,能有几个或一些让人感念的人和事,也就连带为那个时期带来了颜色。文化是要有一个生态的,民国的艺术与学术,基本还保留了精神的多样性,使得各类人物有了驰骋的机会。超人的激情与禅林之风,左翼斗士与自由主义绅士,托派与安那其主义,遗老和西崽,演绎了诸多的故事。我们后人看这些,惊异和好奇,感叹与爱怜,复杂地穿梭着。于是便叹息自己的身边,从未出现过这样丰满的精神群

落。少年及青年时枯燥封闭的生活，在我是一种缺氧，我写它，其实就是吸氧的过程。原来我们的前人还有如此跌宕的日子，可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这些？我们的前人未必料到，他们苦苦挣扎、厮杀得来的结果，竟是精神盘詰的消失。每每想到此，我就疑惑地问：是五四的先驱要负责任，还是我们后人要负责任呢？

俄国人列夫·舍斯托夫说：“世界是处在天然无知之中，天然无知乃是人的真正德行。”古老的民族，要育出新的苗圃，是大不易的。民国文人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最早拓出精神的盲区，甚至吃着禁果。自己死了却让别人活着。他们在做着冲击认知极限的事情，犹如尼采笔下的狂士，在荆棘里无畏地前行着。空幻者与殉道者甚或失败者，演绎的是亘古未有的故事。一个气象不俗的时代，是不需要以成败论述的。而有时，只有独自个人地叩响历史之门，并试行道路本身，才可以触摸到精神的体温。我在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求索者那里，先前的尺度没有意义。

我过去曾说，描述那个时代，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无知。可是直面那一切的时候，才知道无知在我的生活里盘绕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无名的惶恐在暗暗地袭来。我无法逃脱旧有的尺度。在回溯往事的时候，语言几乎失去力量。我知道其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认知的悖论，可是带着这悖论，依然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惊喜的存在。而结果是，对自己的过往，不仅是怀疑，而且是空漠着了，几乎是一片无有。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来，新的瞌睡又开始了。那些闪烁的奇光，究竟能停留多久还是个疑问。

感谢几位好意的朋友对我的鼓励，自己的文字能结集出版，自然是高兴的事。本欲续写一些内容，可惜俗事缠身，无暇为之。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周为军建议增添些旧作，考虑再三，只好应命。好在篇目不多，也一并编在一起了。我真切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在诸种意见和审视里，无知才会变得少些。民国的人和事，没有写尽的时候。

2007年11月13日

目录 CONTENTS

目
录

● 狂士们 / 1

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

● 夜集声 / 25

在他的朋友的回忆里，鲁迅的形象是灰蒙蒙的，蓬乱的头发、矮矮的个子，说一口绍兴话。他的长衫也普通得很，仪表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有人描述他时，说面带黄色，有点憔悴，但吸起烟时颇有精神……

● 同 人 们 / 49

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埋下了伏笔。

● 在 路 上 / 75

大家都在行进的路上,前面是茫茫的夜,身后也是茫茫的夜,就那么走着。依偎地前行是一种走,独自地跋涉也是一种走,在往通明天的路上,有更好的方式么?

● 未名社旧影 / 101

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

未名社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青士、李何林……

●《语丝》内外 /123

旧报刊里的故事，有着国民的心史。因为编者的趣味，儒士之风也进入了其中。近代文人，凡有作为者，多少与报刊有关，有的甚至终身为报人，功德是无量的。康有为之于《知新报》，唐才常之于《湘学新报》，严复之于《国闻报》，梁启超之于《时务报》，都是人所共知的，近代文化的核心东西，于此都有不解的因缘。等到民国以降，报刊的力量已像奔腾江水，浩荡无阻，驰骋天下了。

●古道西风 /147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成立了，斯文·赫定、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月下诗魂 /169

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苏雪林……这些绅士阶层的文人，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到处是葱翠的草坛，木栅的古色，桥边荫下的绿梦，群雕下诗人的晚钟……中国布尔乔亚的梦幻，在这一群人中一直隐现着。

● 新旧之变 / 189

旧中有新，新里含旧，乃那一代文人的特点，与明清文人毕竟有别了。只要留意那代文人的遗墨，就不能不感动于东西方文明交错的魅力。在那些人中，外来的与固有的东西有时还处于碰撞的状态，间或还显出错杂、零乱的排列，不过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别别扭扭之中，诞生了罕有的生气。古无此类新人，今无其继者，那也像六朝之人，后人只能爱之而不可及之了。

● 故都寒士 / 207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淡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狂士们

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

亦新亦旧的狂士风流
国危世乱的文人侧影



1

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

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

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待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



陈独秀像

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稀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〇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复，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

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着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方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2

有一个现象是颇值得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 1884 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 1907 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在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

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 G. Byron 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 Byron 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文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 1903 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 1903 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 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 1902 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是陈独秀所邀的吧。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他是少见的。1907 年，看了曼殊所译的